

總理遺教

軍人精神教育

中國國民黨福建省執行委員會印

孫總理演講軍人精神教育

第一課 精神教育

(一) 精神教育之要旨

今日集諸君於一堂，講授軍人精神教育，乃欲使諸君得有充分之軍人精神，而共任前途非常之大業也。諸君本屬軍人，固曾受軍人之教育，亦曾受軍人之精神教育，惟諸君前此所受者，不過尋常軍人之教育，而非非常軍人之教育也，今在諸君之目前，有非常之事業，必待非常之軍人以成之，諸君欲身任非常之事業，則必受非常之教育乃可，此非常之教育為何，即軍人之革命精神教育是也。此次諸君遠涉桂林，渡長江而北，直搗幽燕，所為者何事，率直言之，革命而已，革命云者，即掃除中國一切政治社會上舊染之污，而再造一壯麗華麗之新民國，為民所有，為民所治，為民所享者也，此為今日順天應人之事，志士仁人不可不勉，吾輩生在中國，丁此時艱，種族存亡，人人有責，亟應同負革命責任，以成此非常大業，惟負此責任，非有革命精神不為功，革命事業，在十年以前，雖已推倒滿清，成立中華民國，然以言成功則猶未也，武昌革命後，所謂中華民國者，僅有其名，而無其實，一切政權，仍在腐敗官僚專橫武人之手，益以兵災水旱，迄無甯歲，人民痛苦，且加甚焉，此即革命未竟全功，因而難收良果也，此次革命，將以補足前此未完成之事業，繼續為之，故本總統此行，即與諸將士同心協力，應革命時機，建革命事業，

聲威所至，無不爭先響應，裹糧景從，故不待兩方交綏，已可決勝，此必然之勢，無可懷疑者也。諸君不信，可觀各國歷史，及現今時勢，則知革命爲世界潮流，亦卽爲順天應人事業，其成功之左券，有可預操者，各國中如美如法，皆爲革命先河，最近如俄，其勞農政府，亦由革命造成，是其例也，我國革命，已及十年，雖有著成效，然風氣日開，民智日進，而時下之奸雄強暴，亦必假託民意，始得生存於國中，此足見潮流之猛烈，非人力可以當之者，故此時有順天應人之必要，則當以革命事業爲己任，質言之，卽能負責任與否之問題也，解決此問題，先問有無革命精神，有革命精神，成功必矣，但革命精神何自來耶，是在精神教育，諸君之所以爲軍人，非爲有軍人資格乎，非爲曾受軍人教育乎，否則執路人而目之曰軍人軍人，如何其可，今茲所述之精神教育，卽欲諸君灌輸此精神於腦中，須與弗離，雖至造次顛沛之間，守而勿失，夫然後可以爲軍人，可以言革命，可以卜成功，反是則否。

今日之革命，與古代之革命不同，在中國古代固已有行之者，如湯武革命，爲帝王革命，今之革命，則爲人民革命，此種革命，乃本總統三十年前所提倡者，此革命主義，卽三民主義，（一）民族主義，（二）民權主義，（三）民生主義，第一之主義，爲種族革命，謂排除他種民族，發揚自己民族；組織一完全獨立之民族國家也，第二之主義，爲政治革命，謂人民直接與政權，簡言之，卽如選舉權，罷官權，複決權，創制權等，由人民直接行之，非代議制之下之民權也，（參看本總統所著之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），第三之民生主義，爲社會革命，亦卽經濟革命，謂社會上之財產，須平均分配，不爲一般資本家所壟斷

也，三種主義，大要如此，若論種族革命，前此滿清專制時代，四萬萬人民，受其壓抑，莫敢誰何，苟且偷安者流，復不知民族主義，甘心俯首，樂爲臣僕而不辭，自經本總統提倡革命以後，稍有知識者，雖亦知漢族不宜受治於滿人，然終不免遲疑卻顧，以爲滿人已占居優勝地位，根深蒂固，論土地則有二十二省，論兵力則有海陸各軍，以身無尺土，手無寸鐵之一人，縱使鼓吹革命，將操何術以勝之，是直螳臂當車，多見其不知自量，故當時有笑予爲瘋漢者，謂此事絕對不能，予則深信革命乃順天應人事業，其不成功者不爲也，非不能也，彼滿清之於中國，以少數人壓制多數人，以野蠻人壓制文明人，在理在勢，均所不可，吾何憚焉，因有此決心，遂能貫徹主張，使革命思想，漸次膨脹，終乃有武昌起義之事，民族革命，始能實現，此則由革命黨人以革命精神鑄成之，所惜者，推翻滿清之後，革命黨人以爲已奏凱歌，躊躇滿志，不於政治上，社會上，同時加意改良，故直至今日，建設事業，尙未完成也。

二 精神之定義

今所述者，爲精神教育，欲知精神教育，當先知精神爲何物，欲知精神之爲何物，當先下定義，定義云者，就於一種事物以簡單之說明，能確知其爲何事物之謂也，譬如人在世界，究爲何物，從哲學上解釋，要確知人之所以爲人之真義若何，始爲圓滿答覆，若云人卽是人，不得謂之定義，依予所見，古人固有言「人爲萬物之靈」，然則萬物之靈，卽爲人之定義，至於精神定義若何，欲求精確之界限，固亦非易，然簡括言之，第知凡非物

質者，即爲精神矣。

精神之爲何，須從哲學上研究之，曠觀六合之內，一切現象，釐然畢陳，種類至爲繁夥，今先就其近者小考言之，一室之內，一案之上，茶杯也，木頭也，手錶也，奔赴吾之眼中者，吾皆能縷指其名，以其有質象可求也，再由一室一案，推而至於桂林一省，地大物博，種類更多，或有爲吾所不能知，所不能名者，再由桂林推而至於各省，或全國，或世界，則形形色色，雖集多數博物家，不能求其萬一，物類之繁，概可知矣，然總括宇宙現象，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，精神雖爲物質之對，然實相輔爲用也，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，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爲絕對分離，而不知二者本合爲一，在中國學者，亦恆言有體有用，何謂體，即物質，何謂用，即精神，譬如人之一身，五官百骸，皆爲體，屬於物質，其能言語動作者，即爲用由人之精神爲之，二者相輔，不可分離，若猝然喪失精神，官骸雖具，不能言語，不能動作，用既失，而體亦即成爲死物矣，由是觀之，世界上僅有物質之體，而無精神之用者，必非人類，人類而失精神，則必非完全獨立之人，雖現今科學進步，機器發明，或亦有製造之人，比生成之人，毫髮無異者，然人之精神不能創造，終不得直謂之爲人，人者有精神之用，非專恃物質之體也，我既爲人，則當發揚我之精神，亦即所以發揚爲人之精神，故革命在乎精神，革命精神者，革命事業之所由產出也。

(二) 精神與物質力量之比較

精神與物質相輔爲用，既如前述，故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，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

，今人心理，往往偏物質方面，若言北伐，非曰槍枝務求一律，則曰子彈必須補充，此外種種武器，亦宜精良完備，一若不如是，則不能作戰者，自予觀之，武器爲物質，能使用此武器者，爲持人之精神，兩相比較，精神能力實居其九，物質能力僅得其一，何以知其然也，試以武昌起義爲例，當日滿清之武器，與革命黨人之武器，以物質能力論，何啻千與一之比較，革命黨人獨不慮以卵敵石，乃敢毅然爲之者，因其時漢口革命機關業已破露，黨人名冊亦被搜獲，兵士之入黨者，均爲查悉，悉數調往四川，僅有砲兵工兵兩營，留駐武漢，其中同志尙多，有熊秉坤者，新軍中一排長耳，見事機已迫，正在大索黨人，若我不先發制人，終必爲人所制，置於死地而後生，等死耳，不如速發難，因將此意告諸同志，僉以無子彈對，後由熊秉坤向其友之已退伍者，借得兩盒子彈，分授同志，革命之武器，所持者，僅有此數，鎗聲一起，砲兵營首先響應，瑞徵，張彪，相繼逃竄，武昌遂入革命黨人之手，彼滿清方面，軍隊非不多也，鎗彈非不備也，當革命風聲傳播之時，瑞徵且商請某國領事，謂若湖北有事，請其撥兵艦相助，布置如此周密，兵力如此雄厚，乃被革命黨人以兩盒子彈打破之，諸君試思，兩盒子彈，至多不過五十顆，即使一一命中，殺人不過五十人，能打破武昌乎，予以爲打破武昌者，革命黨人之精神爲之，兵法云，先聲奪人，所謂先聲，即精神也，準是以觀，物質之力量小，精神之力量大，可於武昌一役決之，此第就本國而言，已有此先例，試再言外國，前此意大利人，有加利波利地者，爲一有名之革命家，彼亦非有如何武器能力，當其渡海攻城也，以一千人與三萬人敵，相持四五日，卒由他路抄襲入城，此在戰略上，戰術上，無論如何，均不能取勝，而事實之相懸

若此，將謂以少勝衆乎，直乃精神勝物質耳，又如日俄戰爭，俄國兵力，多於日本數倍，未戰之先，咸以爲日本之於俄國，不啻驅羊牛豕以膏虎吻，必無幸也，何以戰爭結果，卒至俄敗而日勝，此無他，俄之敗，敗於無精神，日之勝，勝在有精神而已，諸君不觀夫牛與童子乎，牛之力量大於童子，人皆知之，而童子能以一繩引牛，東則東，西則西，牛乃不能奮其一角一蹄，以與童子抗，且甘心俯首，惟命是聽者，是因何耶，童子有精神，牛無精神，故童子之力量雖不如牛，而能以精神制馭之，此尤顯而易見之例也。

依上述各例，則知此次北伐，亦惟恃有精神，即能制勝，可勿問敵人之子彈多少，我之子彈多少，但問我之精神如何，若無精神，子彈雖多，適以資敵，一旦臨戰，委而棄之，非爲敵人運輸戰利品乎，故兩國交戰，能撲滅敵國之戰鬥力者，即在撲滅敵人之精神，而使失其戰鬥能力，兵法有言，攻心爲上，攻城次之，攻心者，務先打破敵人之精神，取得城池，猶其後也，去年粵軍回粵，既下惠州，桂軍聞風破膽，先自逃竄，我乃兵不血刃，長歌而入廣州城矣，此足見物質之不可恃，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，其道何在，精神爲之也。

(四)軍人之精神

諸君皆曾受軍事教育者，自必富於軍人之精神，惟現今之爲軍人，與前不同，須具有特別之精神，造成革命軍人，方能出國家於危險，以現勢論。瓜分中國之說，表面上似甚冷靜，實則不然，其在以前，此種論調頗高，吾國人士，尙抱有亡國亡種之痛，思所以挽

救之，自武昌革命而後，乃漸歸沉寂，以爲外國不復言瓜分中國，遂亦相與忘之，此乃大誤，現時之中國，前途險象，較先尤甚，南北分立之局，擾攘數年，未能統一，北方內部且復各樹私幟，如張作霖，曹錕，吳佩孚等，割據地盤，擁兵自衛，政治之壞，過於滿清，人民轉徙流離，如在水深火熱之中，待援孔亟，援之之法維何，須用革命之手段，用革命之手段，則須負革命之責任，革命之責任者，救國救民之責任也，諸君既爲軍人，又爲革命時代之軍人，倘不能負此責任，坐視國家之內憂而召外患，馴至於國亡種滅，其咎亦誰尸耶。

諸君在此聽講，有爲滇軍者，滇人必知滇事，且必願聞滇事，夫與滇省接壤者，非有緬甸乎，非有安南乎，緬甸則征服於英國矣，安南則並吞於法國矣，試以安南言之，法國對於安南，專用一種愚民政策，諸君試思安南人所讀何書，則猶是從前之八股文也，凡關於新教育之知識，毫不使之聞知，且禁絕之，前此有三十餘人，自安南潛渡日本留學，事爲法國政府所聞，向日本政府要求，將其悉數解回，日本礙於邦交，遂允其請，送回之後，即不知此三十餘人之生命如何矣，英國對於緬甸，亦用此種政策，蓋恐其知識增進，思想發達，將脫離而獨立也，如緬甸安南者，實爲吾國前車之鑒，倘不及時振奮，仍自私自利，釀成四分五裂之局，中國前途何堪設想，諸君再觀英國所用政策，便當覺悟，彼非以西藏之兵來攻打箭爐耶，西藏爲中華民國五族之一，固明明中國人也，中國人而可以攻中國，中國人而可以爲外國人效力來攻中國，此其例即如滿清咸豐時代，英法聯軍因鴉片事件與中國構釁，英法即招中國廣東潮州人爲兵，號稱潮勇者，使之攻大沽，攻天津，攻北

京、焚圓明園。凡此諸役，皆潮勇爲之。以中國人攻中國人，以中國人爲外國人效力攻中國，可痛孰甚。現時國勢至此，民窮財盡，已達極點，凡爲中國人，而又爲此時之中國軍人，倘尚不思救國救民，縱使外國不復瓜分，中國亦將束手待斃，諸君固皆曾受軍事教育者，當知軍人之職志，在防禦外患，在保衛國家，今先問中華民國是否爲完全獨立之國家，不受外國之箝制，以予觀之，固猶未完全成立也。國會雖選出本總統，而內亂尙未戡定，各省之在北方勢力範圍者，尙居多數，北方已喪失對外之資格，而正式政府，又未經各國承認，當此危亡絕續之交，非先平內亂，而以革命救國不可，以革命救國，非有革命精神不可，無革命精神，則爲法屬之安南，終遭勢力屈伏，有革命精神，則爲英屬之愛爾倫，終得崛起自治，此外再徵諸印度及高麗，蓋知革命精神之必要，印度久受英國壓迫，近亦引起反動，有革命思想，與前不同，觀最近英文報所載，印度人之革命，而被英國政府逮捕者，爲數達六百餘人，可見印度之革命精神，頗有進步，未必終爲英國所屈也，高麗亦然，日本之待高麗，異常苛酷，高麗人本富有革命精神，不甘受制，處心積慮，爲獨立之運動者已久，日本雖防之甚嚴，然若高麗人始終堅持，則必有能達目的之一日也，若論中國領土，如安南，如高麗，如緬甸，如西藏，如臺灣等，或爲中國屬國，或爲中國屬地，要而言之，前此皆中國領土也，今乃已入外國版圖，中國對於各土地之主權，亦同時隨之喪失矣，諸君經過各通商口岸地方，最目擊傷心者，爲外國人管理海關一事，海關乃中國收稅機關，質言之，中國之金庫也，金庫鎖鑰操諸外國人手，國安得而不危，救危之法，禦外侮先自平內亂始，故在今日而言救國救民，必要革命，革命須有精神，此精神卽爲

現在軍人之精神，但所謂精神，非泛泛言之，智仁勇三者，即爲軍人精神之要素，能發揚此三種精神，始可以救民，始可以救國，以下試再分別述之。

第二課 智

(一) 智之定義

軍人之精神，爲智仁勇三者，今先言智，智之云者，有聰明，有見識之謂，是即爲智之定義。凡遇一事，以我之聰明，我之見識，能明白了解，即時有應付方法，而根本上又須合乎道義，非以爾詐我虞爲智也，智之範圍甚廣，宇宙之範圍皆爲智之範圍，故能知過去未來者，亦謂之智，吾人之在世界，其智識要隨事物之增加，而同時進步，否則漸卽於老朽頹唐，靈明日蝕，是以智之反面則爲蠢爲愚。

(二) 智之來源

智何自生，有其來源，約言之，厥有三種，(一)由於天生者，(二)由於力學者，(三)由於經驗者，中國古時學者，亦有生而知之，學而知之，困而知之之說，與此略同，凡人之聰明，惟各因其得天之厚薄不同，稍生差別，得多者爲大聰明，得少者爲小聰明，其智則一，此由於天生也，若由學問上致力，則能集合多數人之聰明以爲爲聰明，不特取法現代，抑且尙友古人，有時較天生之智爲勝，例如甲乙二人，甲聰明而不好學，乙聰明雖不如甲，而好學過之，其結果，乙之所得，必多於甲，此則由於力學也，此外亦有不由天生

不由力學，而由經驗所得之智者，諺云，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」，故所歷之事既多，智識遂亦增長，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，此由於經驗也，要而言之，智之來源，不外此三者而已。

(三) 軍人之智

(一) 別是非

(二) 明利害

(三) 識時勢

(四) 知彼己

諸君皆爲軍人，須知軍人之智，爲軍人精神之一種，尤須知軍人之智，在乎別是非，明利害，識時勢，知彼己，試再分述如左。

何言乎別是非也，凡爲軍人，要先知自己所處之地位，與所負之責任如何，軍人者，爲社會分功，而有保衛國家及人民之責任也，何謂分功，社會上之事業，非一人所能獨任，如農業，如工業，如商業等，在乎吾人自審所長，各執其業，此之謂分功，試再舉例以明之，若使以吾一人漂流孤島，造飯也，打魚也，摘果也，既無他人可以分任，非若住居城市，惟意之所適，造飯則有司爨，卽至打魚摘果，亦皆有各司其事者，故一人之世界，與有社會之世界不同，欲求一飽，須兼數役，其困難可知，又不獨飲食爲然，如欲避風雨，禦寒暑，則須自造房屋，自爲木工，非若在市鎮方地，欲建高樓大廈，但解囊出資

，便可集事，不須自執工人之役也，由此觀之，一人之單獨生活，較衆人之共同生活，難易有別，倘同時漂流孤島者，其數能及十人，則舉凡造飯、打魚、摘果、建屋諸事，不必集於一身，可以分功爲之，如此則勞苦減少，而所得效果亦多，社會者，即分功最大之場所也，合農工商等之各種組織，而始成一大社會，故社會之事業，愈分愈多，則愈形活動，諸君之爲軍人，亦不過爲社會分功之一而已，彼爲農，爲工，爲商者，因各有所事，不能躬執干戈，故有待於軍人之保護，而軍人之生活，則皆取給於彼，衣食住行四者，皆不須自爲，而有人代爲之，然則軍人所爲何事，對於社會所担任之職務何在，是在乎保護人民，與保衛國家，凡軍人分所應爲之事，亦即在此，但如何而始能盡此衛國衛民之職務乎，其最先最要者，爲別是非，是非如何別之，軍人所以衛民，利於民則爲是，不利於民則爲非，軍人所以護國，利於國則爲是，不利於國則爲非，是非不明，則已無軍人之精神，何能護民，何能護國，以予觀之，現時軍人，雖非無能明是非者，但亦有利令智昏之輩，往往但顧目前，以爲我有鎗在，對於人民何求不得，於是軍人之名譽掃地以盡，軍人之責任亦全然拋棄，不能保民，反以害民，社會何貴有此軍人，國家亦何賴有此軍人，諸君既爲軍人，則當思爲社會分功，爲人民爲國家負責，而所以能分功負責者，即在別是非，是非之別，即在合乎道不合乎道，惟諸君自擇之。

何言乎明利害也，利害之與是非，本相因而至，譬如軍隊所過地方，真能秋毫無犯，則民必爭先恐後，壺漿簞食以迎之，故利民者，民亦有利於我，其恃強騷，則民皆望望然去之，如避虎狼，觀去年桂軍與粵軍開戰時，往往桂軍正在前方攻擊，而後方人民出其不

意用種種方法破壞之，或截留械彈，或不供食品，此則因桂軍平日虐待人民，故人民以此報之，可見害人者，適以自害，利害之間，在乎自審，但以利害務求其遠者大者，勿貪其近者小者，何謂遠者大者，軍人以衛國衛民爲己責，其利亦即在此，但因吾國現時之國勢，故曰利害之與是非相因而至，是則爲利，利可爲也，非則爲害，害不可爲也，明乎此，始可謂智，始可爲軍人，始可爲革命之軍人。

何言乎識時勢也，諸君此次遠來桂林，更須渡長江而搗北京，志在統一中國，造成完全獨立之新國家，試問此事，爲何等事業，爲此事者，果有如何把握乎，是在審時度勢而已，古人有言，「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，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」，則知識時勢之必要，固非獨軍人爲然，而在軍人尤甚，何謂時，卽時機成熟與否之問題，成熟則可爲，且爲之也易，不成熟則不可爲，且爲之也難，例如種果，果已熟矣，摘而食之，味必甘美，反是則否，種稻亦然，未至收成之期，雖欲助長，不可得也，何謂勢，卽勢力之順逆，與難易之比較是，例如同一石也，推之下山則勢順，而用力易，若欲移石於山上則勢逆，而用力難，時勢之宜審度若此，此次北伐，以義師而推倒北方之軍閥官僚，直如摘已熟之果，穫已熟之稻，既至其時，應手而落，又如由高山推石，使之下墜，乘勢便利，毫不費力也，現時北方人民，對於北方之腐敗政府，厭惡已極，日望南方之援手，俾得早出陷阱之中，大軍一臨，勢如破竹，此卽若推石下山之例，順而且易，祇問推之與否，推則未有不下者，或以爲北方之軍隊，槍枝較我完備，北伐豈能必勝，而不知時勢既已至此，事半功倍，取之甚易，我則得道多助，彼則衆叛親離，軍隊雖多，猶市人也，槍械雖足，猶外府也，故曰

乘時興勢，無不成功，諸君猶以爲國家尚未完全造成，故軍人之希望甚爲微薄，且渺不可知，造成此完全之國家，即全在軍人，有完全之國家，斯有遠大之利益，請以英美各國待遇軍人之方法，與諸君言之，英美之待軍人，凡服役至一定之年限而退伍者給以全糧，國家且爲擇相當之業務，所生子女，由國家給養，又有其子方服役而父母無以爲養者，亦由國家扶助之，其在戰陣死亡者，子女扶養，須至一定之年限，即子能成立，女已出嫁之謂，父母則給養終身，妻不嫁者，亦如之，彼英美各國，優待軍人如此，故軍人亦爭出死力，以衛國家，吾國軍人，則以未有完全國家，前途如何，希望如何，皆難預揣，或者今日入伍，明日解散，亦不可知，以滇軍論，不特無完全國家，且遠離本省，轉戰多年，其苦尤甚，此後欲求自己之遠大利益，則當乘此革命時機，用革命手段，造出新國家，亦如英美各國之軍人，退伍則給予全糧，即父母妻子，亦皆有所資以爲養，斯則爲軍人之利之遠且大者，若不此之爲，徒貪近利小利，今日搶一商店，明日掠一富家，甚至借拉夫之名，行施劫之實，所獲無幾，而怨謗之積，乃如丘山，此不特無利可言，且行大害所伏，視去年桂軍受廣東人民後方之擾，卒至一敗不可收拾者，是其例也，軍人者，有救國救民之責任，宜思建設新國家，以爲吾終身及子孫之倚賴，且其利不獨在軍人，四萬萬人民或受其賜，其遠大爲何如耶，倘僅貪目前之近利小利，實則害也，非利也，利害不明，已不能自衛其身，又安能衛國，又安能衛民，時機未至耶，實則十年以前，早已成熟，倘武昌革命之時，乘勢打破北京，摧陷而廓清之，北伐之事，不必遲至今日，此即若種果種稻，已至成熟之期，不摘不穫，終亦腐爛而已，時不可失，一誤豈容再誤，願諸君勉之。

何言乎知彼己也，古人云，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，彼即敵人也，現在北方軍隊，其內容極形複雜，約可分為三大部分，一爲奉系之張作霖，二爲直系之曹錕及吳佩孚，三爲皖系之段派軍隊，如浙盧，閩李，陝陳皆是，此三派者，兵力相等，同床異夢，相爭而莫敢先動，則成相持之勢，獨吳佩孚跳梁其間，而爲奉皖所同忌，吳一窮酸秀才耳，既爲旅長之後，騙取南方金錢，擴張軍隊，屢發通電，以贊成共和，建設民治爲言，一時人士，受其欺蒙，北方偽政府亦倚之如長城，彼固宣言不爲督軍者，今則已受僞命爲兩湖巡閱使，彼固矢口擁護民治者，此次入寇湖南，乃有決堤淹軍之舉，湘鄂人民，慘遭荼毒，爭欲食其肉而寢其皮，其名譽已掃地矣，即彼之內部，亦頗不穩固，如某某舊部之某某等，亦傾向我軍，派人前來接洽，吳佩孚自知天怒人怨，恐不能當北伐之師，近且派遣代表來粵，其用意如何，殊不可測，將來能倒戈以抗徐世昌與否，亦尙難知，以現勢言，彼與張作霖尤爲勢不兩立，故時有後顧之憂，更扼要言之，則此三派之人，固已無一願效忠盡力於北庭者，以上所述，爲彼方之情形，至若自己之情形，則如何耶，兩粵固無問題，雲南貴州四川均屬一致，湖南亦準備對鄂反攻，此外散布北方軍隊，其中同情於我者尙多，祇須同負革命責任，發揚革命精神，以此制敵，何敵不摧，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，此則由於南方有主義，北方無主義，南方爲公，北方爲私故也，以有主義與無主義戰，以爲公者與爲私者戰，勝敗之數，奚待蓍龜，但觀此次本大總統來桂，人民歡迎之誠意，即可窺見一斑矣。

軍人之智，如前述之別是非，明利害，識時勢，知彼己四者，固無疑義，但願諸君之

爲軍人者，無論官長士兵，對於人民宜以仁義爲重，須知人民於我爲一體利害與共，不過分功任事而已，我爲軍人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彼乃爲農，爲工，爲商，以供我之衣食者，卽有待於我之保護，倘不能保護，而反殘害之，彼若相率裹足，無復敢爲農，爲工，爲商者，軍人之衣食將誰供乎，是其受害，仍在自己，故軍人之智，須以合於道義者爲準，諸君既有天生之聰明，曾受軍事教育，而演軍又皆身經百戰，富有軍事上之經驗，於智之來源，固已兼備，誠能發揚其精神而光大之，何患乎北伐，又何患乎北伐之不成功耶。

第三課 仁

(一) 仁之定義

仁與智不同，於何見之，所貴乎智者，在能明利害，故明哲保身謂之智，仁則不問利害如何，有殺身以成仁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求仁得仁，斯無怨矣，仁與智之差別若此，定義卽由之而生，中國古來學者，言仁者不一而足，據予所見，仁之定義，誠如唐韓愈所云，「博愛之謂仁」，敢云適當，博愛云者，爲公愛，而非私愛，卽如天下有饑者，由己饑之，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意，與夫愛父母妻子者有別，以其所愛在大，非婦人之仁可比，故謂之博愛，能博愛，卽可謂之仁。

(二) 仁之種類

(一) 救世之仁